

# “我们都是打工人”： 新时代青年工人的身份认同与话语建构

谢 榕

**【摘要】**“打工人”作为网络流行词汇,其背后的结构性意义和文化内涵值得深思。作为一种语言文本,它反映出青年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境遇:雇佣工作制度下的约束感和科学管理体制中的劳动自主性缺失。“打工人”的传播过程将抵抗意识与归属意愿统一成一种“协商式认同”,在积极规划未来的意蕴中完成了自我认同的重建。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讲,“打工人”符号的领会和应用过程不仅促进了青年工人身份的再生产,还在理论上呈现出身份建构的主体性色彩以及话语建构在工人阶级实体动态生成中的作用。“打工人”是“工人阶级”概念与新的社会情境互动的产物,通过建构和明晰青年工人的身份而补充和扩展了旧的话语体系,赋予劳动、工作和工人以新的内涵。

**【关键词】**“打工人”;青年;青年工人;工人阶级文化;话语;建构

**【作者简介】**谢榕,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技术社会学。

**【原文出处】**《青年学报》(沪),2022.1.63~71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8ZDA163)。

##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10月,流行词“打工人”走红网络。年轻人利用段子、图片和表情包展开了一场调侃和“造梗”狂欢,他们纷纷以“打工人”自居来吐槽自己的工作,或表达辛苦劳累(如“觉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或倾诉工作中的被动地位(如“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早点睡,打工人!”),或在这种无奈中自嘲式地相互鼓励(如“靠别人是公主,靠自己才是光荣的打工人。早安!打工人!”)。通过这些文本中展示的日常工作场景、生活场景和心理状态,抽象的劳动者被赋予了具体化的社会形象。

网络中的符号创造和传播随处可见,但是“打工人”有着独特的社会内涵:它不仅是网络社交中娱乐性的语言符号,也是使用者赋予自己的一个身份标

签。“打工”在惯常语境中多用以描述体力劳动者,但眼下却更多被城市年轻“白领”所使用——他们与传统打工者相比,在新兴媒体上更加活跃,也习惯以“精致”“完美主义”为自己立“人设”——“打工人”一词也因此带有了一种断裂的异质感,它走红的核心并非像其他网络热词那样,在于与原本文化经验的“隔断”与“分解”<sup>①</sup>,而是根源于某种深层洞察和创造联系。“打工人”从字面可以拆解为“打工”和“工人”,这是两个在中国社会发展和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十分重要的概念:“打工”一词与20世纪末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就业流动有关,“工人”则是西方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历史产物,常以“工人阶级”的形式出现在阶级分析和文化分析中。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其生成、态度和传播过程表征参与者个体的某种身份认同,而工作和对工作

的感知与评价是现代人类社会身份感的重要来源。“打工人”这一描述当代劳动者劳动与工作境况的网络流行词与特定群体所处的社会情境有关,蕴含生成性的话语内涵。分析该话语文本的社会意义和形成,以及它如何建构起当代青年工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理解“身份”与“话语”在理论上的关联,是本研究尝试达到的目标。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廓清“打工人”的社会结构根源,明晰其文本内涵以及文化实践基础。

## 二、流动的工人阶级概念与“打工人”的社会结构基础

在互联网语境中,“打工人”和“打工仔”一样,都是为了微薄工资而起早贪黑、辛勤工作的上班族。“打工仔”“打工妹”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词汇,以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寻求就业机会为背景,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以农民工为典型代表。21世纪以前,“打工”充满了负面内涵,因为打工者面临收入不稳定和社会保障上的不公平,处于经济文化边缘地位;主流话语也将其建构为理性缺乏者和城市不稳定因素。随着经济改革的扩大和深入,农民工被国家认定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sup>[2]</sup>,同时市场经济模式下以薪水为生活来源的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多,“打工仔”的说法逐渐过时。“打工人”与之相比,仅有一字之差,内涵却相去甚远,创造和传播这一词汇的主体并非产业工人和农民工,而是信息技术时代的公司“白领”或“非生产性劳动者”。

其实,“工人阶级”概念在学术史中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对这一过程的简短回顾能够为我们解释“打工人”现象提供一种理论背景。

### (一)“工人阶级”概念变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工人阶级一直是无产阶级的同义词,指由于缺乏生产资料而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是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拥有自己的阶级意识,“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认识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下的

社会结构分裂:机械化与工厂制度使得旧时的手工匠人被剥夺了在家庭作坊中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机会,只得进入工厂成为一名雇佣劳动者。彼时,产业工人就是无产阶级最典型的代表,集中在纺织、制铁、运输和机械制造等行业<sup>[3]</sup>。进入20世纪,西方“工人阶级”理论话语由于以下事实而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缺乏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而生存的境地,“受雇佣”成为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唯一出路,而且劳动群体内部职业分工越来越复杂,商业、管理和技术岗位从业人口持续增加,“工人阶级”概念也随之呈现出可分析性和弹性,且一直处于被塑造的过程。例如,高兹将其形容为“非工人-非阶级”<sup>[4]</sup>,米尔斯等人则提出“新工人阶级”概念以囊括经理、销售和服务人员、掌握专业技术的工人、办公室职员等<sup>[5]</sup>。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哈里·布雷弗曼重置了工人阶级的内涵,赋予其“流变性”——不把工人阶级看作对某一人群的概括,而是将其视为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概念。经理阶层、销售和服务、政府职员都可囊括进工人阶级范围之内,他们和产业工人一样都属于雇佣劳动者,其劳动过程都丧失了自主性,不存在根本上的差别。布雷弗曼将劳动自主性的缺位归因为以“去技能化”为主旨的科学管理技术的普及。尽管第二代劳动理论家认为不应过度无视劳动者的能动性,但劳动过程被客体化、失去自决性已经成为辨识工人阶级的分析性标准之一。以办公室工作为例,经由泰勒式的流程设计,白领职员更接近于操作的主体而非劳动的主体,甚至倒水、从椅子上站起来、打开抽屉、打字的时间都被严格计算<sup>[6]</sup>,他们也常常表现出对工作的反感和厌倦情绪,反对这种自主控制权的丧失。另外,劳动技能的降低还意味着劳动保障的不安全性,工人在劳资权力关系中并没有什么谈判地位,随时可能被替换。然而,雇佣劳动已成为社会中主流的工作制度,工人没有参与劳动的其他渠道可选择,即使有反抗情绪,也能够被提高工资的管理措施有效安抚。

20世纪末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

所带来的新兴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对传统劳动形成了巨大冲击。传统雇佣劳动模式很大程度上被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弹性工作机制所取代,劳动形态多元化;服务业在信息技术革命下更是经历了断裂性变革,工人阶级在意大利学者哈特和奈格里的笔下转型成为非物质劳动者——大众<sup>[7]</sup>;盖伊·斯坦丁将不稳定工作、不稳定收入的劳动者称为“不稳定无产阶级”<sup>[8]</sup>;现今生活中陆续出现的各类新兴就业者(如程序员、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等)则被近年来的经验研究收纳进“数字工人”的范畴。

总的来说,从垄断资本主义到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外延始终在变化中,而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要素始终作为工人阶级自我认同和身份变迁的基础发挥着结构性作用。当下的流行文本中仍能看到这种社会位置特征所发挥的奠基性作用。

(二)谁是“打工人”?——流行文本中的工人阶级印记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工人阶级话语一直处于被建构的状态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人”主要是指被国家赋予主人翁地位以及相应福利保障的国企工人。进入市场转型阶段,私企和外企参与到与国企的竞争中,国企工人失去了原有生活和工作权利方面的保护,其身份感也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农民工在工厂生产生活制度的规训中、在彼此共同利益的关注中,以及在面临城市融入和公共服务不平等对待的遭遇中经历了农民身份渐渐消逝、“新工人”身份逐渐形成的过程。进入数字信息时代,互联网企业中的新兴就业人员成为公众舆论和研究的对象,这些被称作“数字工人”的劳动者涵盖了“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的生产、流通与使用所牵涉的所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sup>[9]</sup>,不论是拥有高学历和高技能的程序员,还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快递员和外卖骑手,都属于“挣薪水的人”,其就业都受到劳动力市场规则的限定,劳动过程也都受管理技术手段的控制。一句“都是打工人”淡化了不同的劳动位置上职业、收入和地位的差异,但“工人”标签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白领”来说并不算错位,而是具有结构意义

上的合理性。“打工人”文本中所表述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都能从工人阶级的结构性特征中找到根据。

首先,当代劳动者的焦虑和被动感根源于工人阶级只能以受雇佣的方式进入劳动过程的社会位置。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以抽象劳动换取生活资料是唯一出路,毕竟“打工嘛,生活里80%的痛苦来自打工,如果不打工,就会有100%的痛苦来自没钱”。与马克思笔下的产业工人不同的是,在“要求我们在个体生命中去解决系统矛盾”<sup>[10]</sup>的个体化趋势下,当代“打工人”没有试图通过集体行动寻找出路,而是在“为自己负责的”的主观领域中将焦虑情绪转化为自我鼓励:“早安,打工人!说‘上班’,就感觉像是为生活所迫,不情不愿。说‘打工’,就像是带着美好的憧憬,用努力和汗水去创造未来!”这种“奋斗个体”形象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妥协,也是他们在“生活只能继续”的认知之下的策略性选择。

其次,劳动自主性的缺乏使工人的工作过程充满被控制感。尤其当算法作为一种技术架构完全嵌入了生产管理过程,这种失控感被进一步加剧。缺乏劳动“自决权”导致的灰心丧气最初体现在生产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身上<sup>[11]</sup>,而当代“打工”青年也如出一辙。这一方面来自科学管理制度对工作节奏的规范,另一方面来自技术系统对劳动过程的完全掌控。工人的技能水平和对工作全过程的了解程度越来越低,与之伴随的对工作的厌倦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印记。社会学语境中出现得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无产阶级”“高科技血汗工厂”<sup>[12]</sup>等概念代表了这一过程在数字信息时代仍在持续且变本加厉。例如,数字化要求大量人员从事重复性的、低技术的数据输入、信息识别和文案工作,和20世纪中叶美国的办公室工作一样,这一类工作也缺乏晋升机会,且更少受到法律保护;在时间和空间被互联网压缩的“社会加速”时代,数字劳动者还面临利润优先的算法规则对劳动程序和考核方式的设计。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一个巨大的技术系统时会使用“工具人”的概念,指个人作为工具被吸纳进

一种合理性秩序之中,个体特征被视而不见,而“工具人”也是当代劳动者常常用以自我描述的词汇,一切工作步骤都被重新加以概念化,一切都按照精密计算的方法被合理化。

总的来说,工人阶级所处的生产性地位解释了“打工人”特征的客观性来源,给我们理解这一流行文本打下了最深层的结构基础。在流动的现代生活中,身份来源是多元的,除了生产性位置,具体的工作场景、生活场景和文化情境也是自我感知的重要构成。尤其是当代从事“非生产性劳动”,主要输出信息、服务和文化的青年劳动者,他们或面临工作任务与内容的技术化、数字化,或在日常休闲和观念互动中高度依赖互联网环境与网络文化,他们的自我认同越来越脱离团体秩序而呈现出显著的自反性,这种自反性认同离不开个人与他者的对话关系。本研究将当代社会拥有“打工人”的社会结构性特征和文化认同基础的青年劳动者称为“青年工人”。在新媒体时代,他们占有将“打工人”这一流行语传播开来的媒介资源,在自身的身份建构上具有能动性。

### 三、冲突与协商:青年工人身份认同的表征

话语是一组关于某一阶段特有话题的文本、语言陈述或谈论及其表征的结果。以霍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强调,语言符号的意义呈现在互动与传播活动中。“打工人”文本传递的意义在于从中窥得一种新的青年工人认同模式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当代“加速社会”中,在雇佣关系里处于被动位置的青年工人所共同感受到的工作压力和相似的困境成为“打工人”文本得以迅速、广泛传播并不断翻新的共同感知基础和情绪基础,在这一“共同经验”和“感知结构”之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认同模式。

#### (一)青年工人的身份认同冲突

对青年工人的身份认同分析可以从E. P. 汤普森和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获得借鉴。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思想情感和社会实践等文化议题受到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针对决定论色彩浓厚的结构因果论,在阶级结构和阶级行动之间加入了

文化这一中介性要素,将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感受与宏观社会结构勾连起来。自文化社会学发端之时,工人阶级特别是青年工人阶级就是核心分析对象。其中,理查德·霍加特对“奖学金男孩”的描写<sup>[13]</sup>以及保罗·威利斯对“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及其阶级结构再生产意义的分析<sup>[14]</sup>展现了20世纪西方社会职业多样化历程以及由此带来的青年工人认同的代际冲突。这两类青年都生活在劳动群体内部职业结构发生异质化变迁的年代。“奖学金男孩”是“向上流动”的积极参与者,作为传统产业工人的子女,他们可以通过接受文化和专业训练而找到秘书、会计、教师等工作;“家伙们”则由于沉浸在“反学校文化”中而放弃了这种机会,在成年后继续做一名产业工人。对于前者来说,跃迁至中产阶级的可能性与父辈所传承的传统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矛盾,他们心理上被“卡”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中间:面对产业工人父辈,他们会刻意在心理上保持距离,却无法丢弃从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在面临他们想象中的“中产阶级”时,又因为文化、品位、消费等方面的差异,产生了羞耻和不自信。这种矛盾造成了拉扯、犹疑和愤怒,成为这一群体身份感知的一个特征。然而,根据前一部分的分析,这种“阶层上升”主要并非来自个人努力,而是一种结构性后果:产业工人比例下降,被“排挤”出的人员进入销售、教师、会计等岗位。大多数学校教育下青年工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实只是阶级内部结构挪移的产物。

在当代中国社会,许多自称“打工人”的青年劳动者存在与“奖学金男孩”相似的内在冲突。基于社会流动和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背景,来自农村、落后地区或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女渴望通过运用智力和勤奋而获得理想的地位提升。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了一些技能,凭此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在城市CBD的写字楼里找到职位,并以“精致的完美主义者”自居,貌似已经开启了具有文雅的举止、开阔的视野和时尚之风格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然而正如“奖学金男孩”那样,傲慢与羞怯的矛盾,以及将人生视为不断考试来获取奖励的价值观成为这个群体的明显

特征,“小镇做题家”这个网络词汇十分精准地体现了这一点。城市“白领”、大学毕业不久进入工作岗位的年轻人等青年劳动者原本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工作上的主动性,但在工作后却遭遇某种贬低,“搬砖”“写字楼民工”等自嘲就是他们面对这种贬低时的典型反应。即便拥有高技术、高收入,程序员也自称“码农”。“打工人”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的阶段性产物,是一种对自己社会位置的洞悉。其本质在于,科技升级下的工人地位并没有实质性提升,科学技术的“操作自主性”<sup>[15]</sup>仍然掌握在管理者手中。

## (二)协商式身份认同:从隐性抵抗到积极规划

与“丧文化”不同,上述冲突感并没有令青年工人陷入持续的自怨自艾,面对被明褒实贬的身份矛盾,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化解方式:一方面,青年劳动者并没有抛弃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所树立的“榜样”,“早上打工人,晚上尾款人”,消费仍然是他们重要的群体特征;另一方面,他们放弃了对高高在上地位的仰慕,并不掩饰传统工人所代表的吃苦耐劳的形象,而是在集体自嘲中表现出一种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意识。这意味着青年群体在消解身份矛盾时寻找出了一条有效出路:尽管“打工人”的叙事有潜在的抵抗意味,但也表现出与主流话语的合流——以个人奋斗的方式解决不平等问题,通过打工成为“人上人”。起到矛盾消解作用的“打工人”话语将抵抗和规范整合到一种“协商式身份认同”之中<sup>[16]</sup>。认同的边界并非清晰固定的,而是模糊和流动的。对工作过程的抱怨凸显了青年劳动者对劳动关系中的“臣属”地位的感知,鼓励个人努力换取更好的生活前景具有“传统工人”形象中靠自己双手辛勤劳动的奋斗色彩,而互联网沟通特有的“调侃”则促进了“打工人”背后的妥协性意义的生成,从而真实完成了这两种元素在自我认同中的协商与混合。我们可以把这种自我认同形成的过程看作一种内部协商,因为“所有人际传播都涉及针对身份认同或自我认同而进行的协商谈判”<sup>[17]</sup>。经过上述语言实践构建而成的认同便是一种“协商性认同”,类似于卡斯特所提

出的“规划性认同”<sup>[18]</sup>。个体利用所能获得的文化资料将“打工人”文本中隐含的抗拒性内容发展成了一种新的话语,从而在主观上重建了他们的社会位置,带有一种积极规划未来的建设性内涵。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协商性认同的样貌具有某种不稳定性:网络符号的标签化作用随时在游移,青年群体此时获得情绪化解和内心救赎,也有可能在一时刻滑落到另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中去。此外,这种文化研究式分析还在理论上启发我们,“文化转向”令人们不再固守社会位置和行动之间“‘自主’或‘因果’的传统话语,而取文化和结构相互建构、文化差异、文化多元、文化联结松弛的全新话语”<sup>[19]</sup>。以符号性话语为核心的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工人群体认同感的自我形成过程。在后文中,笔者将进一步分析“打工人”身份动态建构的特征及其对工人阶级概念建构的意义。

## 四、青年工人的身份建构

工人和工人阶级概念不是刻板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中相关个体对它的看法、体验、运用,以及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超越个人认知意义上的潮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对“打工人”符号的领会和应用过程不仅促进了青年工人身份的再生产,还在理论上呈现出身份建构的主体性色彩以及话语建构在工人阶级实体动态生成中的作用。正是在以“打工人”为文化符号的沟通过程中,某种可见的意义模式逐渐显形。

### (一)青年工人身份建构的文化实践过程

如果说认同是基于某种共同感知结构而形成的相似认知、态度与情感的联结,那么身份就是这种联结之后某种意义被塑造出来的结果,是经过文化属性加工而成的意义与经验,也就是说文化是应当被重视的中介性要素。可以推论,当代青年工人亚文化的更新也必然导致身份在某种意义上的再建构。劳动力理解、应用和形成自身文化的一系列过程对于在象征层面建构主体身份非常重要。通过“打工人”这一文化符号,当代青年对工人身份展开了一种“主体性再造”的想象,客观上更新了“工人阶

级”形象。

1. 青年劳动者通过“打工人”文本展示了一种自我激励的工人形象,共同创造了一种流行的文化符号。工人阶级文化历来是工人自我激励的来源,在汤普森的笔下,家长制统治、延续几百年的习惯等传统文化是19世纪的工人在面临剥削时保卫自己权利的武器<sup>[20]</sup>。而在当代,互联网成为青年工人亚文化的重要生产空间,娱乐化、隐喻性的网络语言充分发挥了意义得以产生和循环的最具优势的媒介的作用<sup>[21]</sup>。劳动者的能量借此实现了广泛传播,成为工人阶级文化联结的某种动力。在“打工人”文化仪式中,实践者通过努力改善生活境遇的表达引导了一种自我激励的、积极上进的工人形象,体现了自我负责和肯定自身价值的道德取向。这符合文化唯物主义的认知:工人阶级文化不仅仅是某种外部权威的产物,也并非只在与资产阶级文化对应的地位上存在,而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生产过程中处于相似地位的一群人基于共同的实践和观念而产生的,是一种自信和力量的产物。这种工人阶级文化在与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融合过程中,时刻对先进文化持有开放态度,以一种柔性的姿态保持着对当前社会情境的密切联系。

2. “打工人”文化符号循环反复的运用促进了青年工人身份的建构。“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sup>[22]</sup>威利斯在分析“家伙们”时提炼出了这些青年身上具有的蔑视学校的文化倾向,这一倾向通过嘲讽“书呆子”、歧视“女性化”工作等语言形式展现出来。通过这些话语,“真实”的社会关系被转换为概念化的关系,但也正是这种文化形式将真实结构关系“再次折回原地”<sup>[23]</sup>:原本表达着反抗的语言符号成为一种悖谬和“自我诅咒”,“家伙们”就这样通过推崇男性化体力劳动的机制实现了对自己工人阶级身份的服从、认同和再生产。“打工人”作为一个可阐释的符号,同样将关于工作和工人的各种观念、认知和情感具体化地呈现出来,并且在一次次重复和意义添补过程中持续生产着关于“打工”的意义——以被动的方式进入劳动过

程后,主动地承担起实现个人目标的责任。上述文本和意义以可观的规模和速度在互联网中传播和循环,它所代表的观念意识和主观归属感被劳动者所习得后,为当代青年劳动者建构起“打工人”主体意识,进而为形成群体认同提供了素材和情境。青年劳动者所创作的“打工人”文本及其话语风格,进一步作为一种资源被其他处于相同结构位置的人所使用——先表达对自己所处“臣属”地位的不满,然后折返向积极的自我负责与自我激励,便是使用“打工人”这一文本的青年工人主要的话语立场。

这种身份生产意义上的文化分析显示,如何运用符号和文本对身份进行特定叙述是某种“社会想象”得以凝结的基础,身份因之呈现出一种“建构中”的形态。

#### (二)“工人”身份的话语建构中青年主体性凸显

“工人”不仅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话语。工人身份的形成也是一种话语建构过程。在后社会史观(或曰“话语史观”)理论中,话语是“由许多陈述、术语和范畴组成的一种特定结构”,它“使主体得以对世界产生道德感受,并想象自己是世界之中的行动者”<sup>[24]</sup>。我们可以在这一理论观的启示下重塑“打工”话语的变迁:“打工仔”“民工”最初是由主流媒体话语描述的具有负面形象的劳动力,他们“盲目”“无序”,是城市秩序破坏者<sup>[25]</sup>。进入21世纪,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对于经济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极为重要,农民工概念随之进入了积极的话语建构阶段。打工者的群体形象向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劳动者方向转变,他们被认定为“新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眼下的“打工人”则显示出劳动者幽默、上进与自我鼓励的特征。话语的流转决定了关于“打工者”身份认同的不断建构,话语在这里表现为一种“知识”、一组社会性共享的意义,定义和建构了情境中的角色。如果说经济地位与国家力量曾在这一身份建构中发挥绝对的作用,“打工人”的走红则表现出当代个体身份来源的多元化趋向:固定实体或结构因果性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个体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能动性,使得

身份认同成为主体的一部分、一座“意义仓库”。“工人身份”在理论上也脱离了理所当然和不言自明的特征,表现为一种话语建构性的事实。

通过带有网络传播色彩的流行符号的转译,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从属性地位这一“客观事实”被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转变成了一种“主观事实”——同一文化的成员会共享一系列的概念和观念。反过来也成立,以语言为中介“发现”了某种共同概念和观念的一群人会产生群体认同。这种“主观事实”的发现还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S(阶级地位)→C(阶级意识)→A(阶级行动)”阶级分析逻辑的缺陷——受马克思、卢卡奇等学者的影响,20世纪中后期的阶级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将阶级结构暂时固定为某种静止的东西,工人群体形态的边缘被看作是既定的、自然而然的,主体的行为和意识成了结构的牵线木偶。作为主观建构产物的工人阶级分析视角启示我们,阶级的形成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过程,需要在变迁中进行考察。用知识社会学的论点,即“阶级”处于持续被建构的过程中。如果说工人阶级存在某种意义,那么这个意义也并不是清晰透明的,因为意义是一个“随语境、用法和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油滑的家伙”<sup>[26]</sup>,身份的话语建构便是这种“油滑的”意义在个体层面被明晰化的过程。通过“打工人”的流行可以看到主观的身份意义在一场语言实践中如何被能动者“创造”出来,使我们有可能展开一种超越传统结构因果论的、“阶级形成中”的分析。

从“打工仔”到“打工人”,我们的分析意义在于指出,不仅国家具有在意识形态层面建构话语的权力和能力,主体本身也具备建构话语的能动性。个体可以“借助话语,赋予社会背景以意义,理解自身与这些背景的关系,并以此将自身体会和界定为主体和行动者”<sup>[27]</sup>。特别是大众参与的互联网媒体逐渐代替传统媒体成为各种语词、观念产生的公共论坛,在网络符号表达的文化已经积淀成熟的情况下,青年群体具备了建构自身话语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以反语言的符号游戏建构起属于群体的独特话语体系”<sup>[28]</sup>。利用“打工人”叙事,青年工人在网络文

化“圈层化”的结构下共同创造了一种客观的“感知结构”,相关段子的一次次创新、点赞和转发,就是这种感知结构被一次次唤醒、强化和抽象的过程,也是一个“编织因果情节”的叙事过程。独立的事件(如加班、迟到扣工资)被转译成了一个作为社会实在的故事情节,旧的“工人”话语也就被调试和重构而获得新的内涵。

### 五、进一步的思考:“打工人”的话语建构与“工人阶级”的内涵延展

对“打工人”的话语分析除了帮助我们发现青年工人通过文化实践建构出了一种“主观事实”,也表明情感、经验和认知的构造物可以成为客观的社会结果。这一分析让我们能够对文章开头提出的“打工人”与“工人阶级”的理论关系做出另一个角度的回应。正如前文所述,工人阶级在劳动关系中的被动地位是当代青年工人诉述工作困境的结构基础,而“打工人”这一场话语实践则对结构决定论式的回答进行了延展。换言之,“打工人”是“工人阶级”概念与新的社会情境互动的产物,通过建构和明晰青年工人的身份而补充和扩展了旧的话语体系,赋予劳动、工作和工人以新的内涵。

尽管“打工人”话语并没有直接“制造”物质层面上的社会实在,但青年劳动者在无意中将“工人阶级”的特征与自身工作体验进行了语义上的“对接”,从而建构出了一种有意义的实体,“青年工人”便是这一实体的体现。从概念表征上来说,“青年”在这里并不被看重其人口学意义上的年龄属性,而是更像“Y世代”和“Z世代”一样,被强调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文化下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工人”在这里也并不直接与某种产业或行业联系在一起,而是被强调被主体的语言和沟通过程所提取和处理后的一种主观事实——在生产中居于从属地位。互联网这一专属于当代青年成长环境的表达与关联结构成为他们行事和观念形成的依据,“打工人”话语就展现出“青年工人”边界在形成过程中的构成性功能,凸显了“个体及其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修辞性质”<sup>[29]</sup>。从身份认同上来说,青年工人通过“玩梗”所

诉述的经验是对自身状况的表达和对“工人阶级”认知的一种关联,这些表达和关联意味着,关于当代青年劳动者的话题和文本并没有被隔离在工人身份的建构之外,他们的社会位置也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的,而是某种话语模式筛选的效果<sup>[30]</sup>。

工人阶级不仅有客观的社会结构性特征,更是一种话语建构性的存在。“打工人”并没有一开始就持有在集体的立场上表达自身与其他群体间的冲突这样鲜明的目的,事实上,在“打工人”流行之前并没有形成一个渴望利益表达而只是缺乏恰当工具的、成形的群体,而恰恰是在这个词被阅读和使用的过程中,一个具有工人阶级特征的群体被“生成”并“显现”出来,并且成为一种认识论的对象。工人阶级的内在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打工人”文本,一方面是基于劳动职业变迁下工人阶级结构基础的一种映射,另一方面又通过构成一种话语形态而生成了这种结构。“打工人”文本由青年劳动者在职场中被动的“臣属”地位出发,建构了具有“工人阶级”特征的自觉意识,然而这种意识并没有进一步被构造成一种“压迫处境”,“打工人”故事的讲法是在乐观、自嘲的文本中完成了“通过劳动改善处境”的意义自足。“工人阶级”中的“工人”也被赋予了认知的力量,充分体现了主体性意义的建构。我们的分析发现,在当下,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话语性实在”特质越来越突出,这并非否认工人阶级是一个客观性的社会实存,而是着重突出两方面的意义:其一,阶级结构作为客观的社会条件,被个体以某种概念“转译”为一种蕴含意义的存在后才能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其二,工人阶级的主体并非某种固有意义的外在反映或文化投射,而是被某种话语组织起来的,这种话语具有情境性。因此,应当脱离旧有的思维框架,从流动和实践的特征去理解工人阶级。

## 六、结语

习近平曾指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sup>[31]</sup>,还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

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关心和支持青年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sup>[32]</sup>。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工人阶级结构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变化破坏了“打工”一词的稳定性,劳动政策也经历了逐步完善和改进。青年作为最富创造力和活力的劳动群体,通过将自己的感受、认知和思想以文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而领会着这一变动的社会现实。通过青年文化的建构作用,旧的话语体系得以补充和发展,劳动与工作也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这一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敬业”与“勤奋”核心价值观背后的社会伦理与职业精神以独具青年文化特征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在社会保障日益健全、劳动就业政策逐渐完善的当下,当代青年作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表现出了应有的责任和承担。此外,对青年话语生成逻辑与发展特征的分析也启发我们今后如何在隐喻化的网络表达世界中探清青年话语特征的内在规律,以更为恰当的话语策略展开广大青年劳动者的思想政治引导。

## 参考文献:

- [1][28]陈帅.论当代青年的圈层认同感的话语建构[J].中国青年研究,2020(11).
-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EB/OL].(2003-12-31).[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3144.htm](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3144.htm).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20-475.
- [4]吴宁.工人阶级终结了吗?——兼析A.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J].社会,2010(3):146-160.
- [5]赖斯·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周晓虹,译.南京: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6][11]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M].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83,134.
- [7]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8]盖伊·史坦丁.不稳定无产阶级[M].刘维人,译.台北:脸谱出版社,2019.
- [9]SANDOVAL M, FUCHS C, PRODNIK J A, et al.

Introduction: Philosoph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orising digital labour and virtual work—Definitions, dimensions, and forms[J].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14(2): 464–467.

[10] 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 个体化[M]. 李荣善,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1.

[12] 乌苏拉·胡斯. 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 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M]. 任海龙,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6.

[13] 理查德·霍加特. 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M]. 李冠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290.

[14][23] 保罗·威利斯. 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 秘舒, 凌旻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58–78.

[15] 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M]. 韩连庆, 曹观法,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8.

[16] 李继东, 吴茜. 近五年网络流行语的青年身份认同与话语实践[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8): 39–43.

[17] 臧海群. 后疫情时代社交媒体公共治理和媒介素养的多维建构——以网络亚文化社群冲突为例[J]. 新闻与写作, 2020(8): 24–30.

[18] 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曹荣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7.

[19] 约翰·斯图尔特. 沟通之桥: 人际传播经典读本: 第十版[M]. 王怡红, 陈方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

[20] 张亮. E. P. 汤普森的平民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研究[J]. 东岳论丛, 2009(1).

[21][22][27]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 2, 9.

[24][26][29][30] 米格尔·卡夫雷拉. 后社会史初探[M]. 玛丽·麦克马洪, 英译. 李康, 中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1, 30, 62, 72.

[25] 黄典林. 从“盲流”到“新工人阶级”——近三十年《人民日报》新闻话语对农民工群体的意识形态重构[J]. 现代传播, 2013(9).

[31] 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20–11–25(2).

[32]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9–05–01(2).

## "We Are All Da Gong Ren":

### Identity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Young Workers in the New Era

Xie Rong

**Abstract:** As an internet catchword, the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meaning of "Da Gong Ren" is worth pondering. As a language text, it has reflected the working situation of young workers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sense of restraint under the employment work system and the lacking of labor autonomy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of "Da Gong Ren" has unified the "resistance" and the "belonging" into a "consultative identity", and comple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lf-identity in some positive attitude. In a deeper sense,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a Gong Ren" not only promotes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young workers, but also theoretically presents the subjectivity and the role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the dynamic generation of working-class entities. "Da Gong Ren" is a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working class" and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By constructing and clarifying the identity of young workers, we have complemented and expanded the old discourse system and given new connotation to labor, work and workers.

**Key words:** "Da Gong Ren"; youth; young workers; working class culture; discourse; construction